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蘇洵蘇轍散文選集

◆ 沈惠樂 編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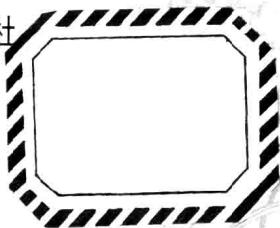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蘇洵蘇轍散文選集

◆ 沈惠樂 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



責任編輯 龔陽卿

書 名 蘇洵蘇轍散文選集

(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)

編 撰 沈惠樂

聯合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印 刷 上海市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 1/32 插頁2

字 數 202,000

版 次 1997年4月第1版

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張 8.875

印 數 1—5,000

書 號 ISBN 7—5325 2242 3/I·1137

定 價 12.30元

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

編纂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散文，興于春秋戰國，歷經漢魏，踵事增華，至唐宋嬗變創新，豪擁以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等八大家為傑出代表的作家羣，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峰。八家的散文理論和創作，皆具獨詣，各樹豐碑，使散文藝術臻於極致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鐫刻了光耀千秋、惠澤萬代的煌煌巨章。

這套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叢書，係從我社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的《中國歷代散文作家選集》大型叢書中輯出。現將叢書編例說明如下：

一、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共七冊，內中蘇洵、蘇轍合為一冊，其他六家各為一冊。

二、諸家選集的人選篇目，力求體現該作家各時期的創作風貌。作品的編次，大抵以寫作時間先後為序，無法編年者置于最後。原文一般以近期出版較完善的點校本為據，槧本多而又無點校本者，擇善而從。各版本異文一般不注，關係到內容理解者則加以注明。

三、各集均有“前言”，介紹該作家生平、思想、創作歷程，着重分析其散文風格的形成與發展變化，提示其創作成就及在文學史上地位等。

四、古代的言文，向不一致。爲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原作，對於入選的每篇作品，均作“題解”、“注釋”和語譯。

竭誠歡迎讀者對本叢書編纂工作批評指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五月

前言

在被稱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八位散文作家中，蘇門父子蘇洵、蘇軾、蘇轍三人，就佔去了三位，可見他們在我國古代散文史上地位之重要。為了方便讀者對蘇洵、蘇轍散文的閱讀和欣賞，這裏先就他們的生平及散文創作的成就作一簡論。

—

蘇洵（公元1009—1066年），字明允，南宋以來多謂其號為老泉，人稱“老蘇”。眉州眉山（今屬四川）人。據蘇洵在《蘇氏族譜引》中說，唐代武后時鳳閣侍郎蘇味道因獲罪而被貶至眉州當刺史，死於任上，其子定居於眉州，眉州從此有了姓蘇的家族。蘇味道本是趙州樂城（今屬河北）人，所以蘇洵父子又常在文章中自稱是趙郡蘇氏或樂城蘇氏。

蘇洵的父親名序，字仲先，母親史氏，生三子，長為澹，次為渙，蘇洵是幼子。據蘇洵《族譜後錄下篇》記載，蘇序“喜為善而不好讀書，晚乃為詩”，“凡數十年，得數千篇”，朝廷郡邑之大事，鄉里農耕田獵之雜務都記載在詩中。“觀其詩，雖不工，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，豁然偉人也。”這些詩後來都沒有保存下來，但從蘇洵的評述中可以知道蘇序的這種詩風對日後蘇洵着眼於現實，致力於實用的

文學思想有着深刻的影響。蘇序布衣終老，一生不仕，後來由於次子蘇洵做了官才被贈為尚書職方員外郎。蘇序對待功名富貴的态度是很淡漠的，這也深深影響了蘇洵。

青少年時代的蘇洵“為人聰明，智辯過人”（曾鞏《蘇明允哀詞》），深得父輩的青睞。但他不喜歡應付科舉考試的句讀、聲律、記問之學。天聖五年（公元1027年），在其二哥蘇渙影響下，參加了進士考試，沒有及第，就索性遊蕩廢學。同年，娶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為妻。程氏夫人出身於書香門第，在她的鼓勵支持下，蘇洵“年二十七始大發憤，謝其素所往來少年，閉戶讀書為文辭。”（歐陽修《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志銘》），二十九歲那年，再去應試，仍然未中。宋代的科舉制度基本上承襲唐代，除貢舉之外，另有制舉。蘇洵在經過兩次貢舉考試失敗後，想走另外一條道路獲取功名見用於世。於是在慶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，三十七歲的蘇洵又去應茂材異等科，結果又遭落選。

經過三次科場的失利，蘇洵開始了新的治學之路。他把過去所做的數百篇文章都燒了，而取出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韓愈及其他聖賢的文章潛心研讀，堅持了七、八年，達到了“讀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”（《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》）的境界，寫文章時感到“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”（同上）。他的文才受到了益州太守張方平、雅州太守雷簡夫的稱賞。此時蘇洵已年將半百了。自己既已失意於科場，就專心教育蘇軾、蘇轍兄弟，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。嘉祐元年（公元1056年），二子學業初成，蘇洵就拿了張方平、雷簡夫致歐陽修、韓琦的推薦信，攜帶二子出蜀。到了京師，蘇洵將自己所著的《權書》、《衡論》、《幾策》等文章呈交歐陽修指教，歐陽修讀後大加稱賞，認為有荀子的風格，並向朝

廷上了《薦布衣蘇洵狀》，朝中士大夫也爭相取誦蘇洵的文章。第二年正月，歐陽修主持禮部貢舉考試，蘇軾、蘇轍同中進士，一時蘇門三士名滿京師。可是，不幸程氏夫人突然病故，於是蘇洵攜二子返蜀守制。

嘉祐三年（公元1058年）十月，朝廷下詔命，令蘇洵試策論於舍人院，蘇洵稱病辭不赴闕。而真正的原因是在《與梅聖俞書》中所說的：“僕豈欲試者？惟其平生不能區區以附合有司之尺度，是以至此窮困。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，奔走萬里以就試，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！”嘉祐四年（公元1059年）六月，朝廷再下詔命，蘇洵顧慮到“若固辭，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”（《上歐陽內翰第四書》），而且為二子的前途計“軾、轍已服闋，亦不可不與之俱東”（同上），於是在這年十月，再次率子進京，次年二月到達京師。因蘇洵拒絕應試，朝廷特任命他為試秘書省校書郎。蘇洵對此很不滿意，一年之後他上書給韓琦，要求別除一官。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七月，太常寺要修纂《禮書》，就授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之職，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《禮書》。歷經三年，《太常因革禮》一百卷終於寫成。治平三年（公元1066年）春，在將此書呈送朝廷而還未獲批復之時，蘇洵因病去世，終年五十八歲。宋英宗特贈蘇洵為光祿寺丞，謚“文安”。蘇洵的詩文集《嘉祐集》，通行本有四部叢刊本和四部備要本，均為十五卷。又有二十卷本的三蘇祠本和清邵仁泓刻本《蘇老泉先生集》。

蘇洵的文章在科場屢試不售，却得到歐陽修的激賞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歐陽修反對時文而提倡古文，洵文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韓愈文為法，深合歐陽修口味；二是蘇洵的某些有關古文創作的主張同歐陽修也頗有相通處。如在文道

關係上歐陽修主張重道以充文，並強調為文要聯繫現實：“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”；要寫好文章就必須關心百事，而“棄百事不關於心，曰：‘吾文士也，職於文而已’”，是寫不出好文章的。（《答吳充秀才書》）蘇洵則提倡文章要有為而作，“有用於今”（蘇洵《上田樞密書》）。蘇洵曾鄭重其事地對軾、轍二子讚嘆顏太初（晁繹先生）的詩文“皆有為而作，精悍確苦，言必中當世之過。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，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”（《晁繹先生詩集叙》）。這說明蘇洵主張文章要切中時弊，有益於民生，注意文章的客觀社會效果，在歐陽修文論思想的基礎上進了一步。再如歐陽修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風，反對艱澀險怪的文字，認為“孟（孟子）韓（韓愈）文雖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”（曾鞏《與王介甫第一書》）。蘇洵則在《仲兄字文甫說》中提出了“風水成文”說，崇尚自然為文：“風行水上渙，此亦天下之至文”；“無意乎相求，不期而相遭，而文生焉”，“非能為文，而不能不為文”的作品是“天下之至文”。蘇洵還在這篇文章中標舉藝術的極致是“無營”，要看不出苦心經營的痕迹。這種文貴自然的思想又深刻地影響了蘇軾，蘇軾“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”（蘇軾《答謝民師書》）的散文理論即淵源於此。並且蘇氏父子比歐陽修更重視文章的藝術技巧。

蘇洵的文章，被歐陽修目為“孫卿子（荀子）之文”，而張方平“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（司馬遷）”。（蘇洵《上歐陽內翰第二書》）韓琦“以為賈誼不能過也”（張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）。蘇洵自己也有意無意地以賈誼自居。他在《上田樞密書》中說：“常以為董生（董仲舒）得聖人之經，其失也流而為迂；晁錯得聖人之權，其失也流而為詐。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，其惟賈生乎？”其實，蘇洵的文章更

多地受到《戰國策》的影響。他自己諱言則是因為戰國縱橫家人品不高。不嘉許蘇洵且屢詆於眾的王安石，倒是道出了“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”（邵博《聞見後錄》）這一特色。

蘇洵散文的成就，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論說文上，而議論的縱橫捭闔，雄辯恣肆，正是承緒了《戰國策》的餘風。這同他善識權變，重視實用的創作動機有一定的關係。他的《權書》、《衡論》、《幾策》無一不是講權變的。他在《諫論》中說：“龍逢、比干，吾取其心，不取其術；蘇秦、張儀吾取其術，不取其心。”主張大臣進諫時不但要懷有忠心，而且要講究語言的藝術，明確地表明對縱橫家因勢利導的雄辯藝術的愛好。而對孔子所主張的諷諫要“純乎經”，即要根據經典、依照常規的方式表示異議，認為應該“參乎權而歸乎經”，像縱橫家那樣機智權變，纔能達到為文的預期目的。因此他的論說文往往從療救時病的目的出發，效法縱橫家的文辭，析理精微，博辯宏偉。

為使政論與史論更有現實意義，蘇洵常採用引古論今，借題發揮的手法。如《六國論》，“老泉原是借六國以諷宋，讀者須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。”（清·過珙《古文評注》）蘇洵談的是歷史上六國敗亡之事，其意却在於為當時朝廷提供起衰救弊的策謀，反覆論證，筆墨酣暢，水到渠成，顯示出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。《廣士》也是如此。談的是選用人才的問題，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。文章肯定了古代取士“取於盜賊，取於夷狄”、“貴而貴取，賤而賤取”的唯才是選的方法，深刻揭露了北宋當時唯以“進士制策”制度取士的弊病。文中徵引古今，反覆比照，孰是孰非，一目了然；而一連串的排比句和形象性的描繪，更顯示出洵文雄辯遒勁的特有風格。

據實立論，翻出新意，則是蘇洵史論、政論所慣用的又一手法。如《管仲論》遠逸出對管仲這一歷史人物素有的定評，而根據管仲死後不久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佞人受重用，以致齊國人亂國無寧日的史實，圍繞着管仲生前未能舉賢自代的失誤展開議論，筆端時露鋒芒，意思層層翻進，結論如老吏斷獄一般使人無從置疑。再如《高祖》篇，從“為後世子孫之計，陳平、張良智之所不及”的議題來評價漢高祖劉邦，肯定他的智謀“明於大而暗於小”，實發人之所未發。文章從高祖談到呂后，再旁及樊噲，跌宕起伏，波瀾橫生，而剖析入微，纖毫必露，確有戰國策士言談之遺風。

綜上所述，蘇洵議论文的優點是不為空言，言必有中，其文辭“縱橫上下，出入馳驟，必造於深微而後止”（歐陽修《蘇明允墓志銘》）。但是，也像宋代李塗所指出的：“蘇門文字，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”（《文章精義》），縱橫家虛妄浮誇的辯辭多少也影響了蘇洵，使他的文章不免存有強辭奪理、主觀武斷的地方，如《高祖》中說樊噲的必助呂氏作亂。

蘇洵的記、說、書啟之類，體現了與論說文完全不同的風格：紆徐婉轉，富有情韻。如《木假山記》，極盡其辭，鋪敘樹木所遭受的劫難，巧妙地寄寓了人生的感慨，意味深永。《仲兄字文甫說》中，寫水寫風，隨物賦形，曲盡其妙，“極形容風水相遭之態，可與莊子言風比美，而其運辭却從《上林》、《子虛》得來。”（《古文辭類纂》）《名二子說》的短小雋永，富有哲理與機趣，更令人嘆賞不已。蘇洵的書信別有含蓄深微、宛曲達意的趣致。如被清人儲欣讚為“老蘇先生第一書”（《唐宋八大家類選》）的《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》，這本是一封要求對方引薦的書信，但寫來不露聲色，先從慶曆新政中范仲淹諸君子的離合聚散，說到對歐陽修的

不勝仰慕之意。又從孟子、韓愈等人為文風格，襯托歐文“紆餘委備，往復百折，而條達疏暢，……無艱難勞苦之態”的特色，從而顯出自己對歐陽修了解之深。最後自述自己學文的經歷和體會，希望對方也能了解自己。千迴百轉，看似與寫信目的無多關係，其實無一不是圍繞着自薦的中心而展開，盡脫俗態，親切感人。

蘇洵散文的成就，雖然比不上韓愈、歐陽修，但也卓然自成一家，深得人們的喜愛。特別是他對兩個兒子所起的熏陶、培育的作用，更應記上一筆。故清人邵仁泓在《蘇老泉先生全集序》中說蘇洵“上繼韓、歐，下開長公兄弟（蘇軾、蘇轍）”，確當地概括了蘇洵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。蘇軾文本叢書另有專集選講，本書則選洵、轍父子文，都為一集，以期使三蘇精要，大備於叢書。

二

蘇轍（公元1039—1112年），字子由，一字同叔，晚年號穎濱遺老，人稱“小蘇”。因生於仁宗寶元二年（公元1039年）己卯，蘇軾嘗稱其為“卯君”。幼年時與兄蘇軾同在家鄉讀書，並得父親蘇洵的親授。十七歲時娶妻史氏。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兄弟同時進士及第，名動京師。嘉祐六年與蘇軾同登制科。二十三歲的蘇轍被授以試秘書省校書郎充任商州（今陝西商縣）軍事推官。這時蘇洵受命修《禮書》，而蘇軾又出任鳳翔（今陝西鳳翔）簽判，於是他奏請留京侍父。英宗治平元年（公元1064年）十二月蘇軾從鳳翔解官歸京師，第二年蘇轍始出任大名府（今河北大名）推官。治平三年蘇洵病逝於京師，軾、轍扶棺返蜀。神宗熙寧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冬，服喪期滿，次年春返京師。其時，

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，已開始變法。同年三月，蘇轍上書，提出去冗吏、冗兵、冗費以豐財的建議，神宗即日召對，並任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。八月，因對新法提出異議，並自請離職外放而觸怒王安石，被調任為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陽）留守推官。熙寧三年春，張方平知陳州（今河南淮陽），蘇轍被辟為陳州教授。熙寧六年改任為齊州（今山東濟南）掌書記。熙寧九年王安石罷相，蘇轍回京師。次年，張方平為南京（今河南商邱）留守，辟蘇轍為簽書判官。元豐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八月蘇軾被彈劾為謗訕朝政而下御史台獄，蘇轍上書要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，不准，於同年十二月坐貶監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鹽酒稅，直至元豐七年纔被調任為歙州績溪（今屬安徽）令，第一次擔任地方長官。

元豐八年（公元1085年）三月，神宗病逝。哲宗即位，年僅十歲。宣仁高太后聽政，起用司馬光。八月任蘇轍為秘書省校書郎，蘇轍感慨作詩自嘲：“奔走半生頭欲白，今年始得校書郎”（《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》）。而在同年十月，蘇轍又被擢為右司諫，自此仕宦生涯開始了一個嶄新的階段。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二月，蘇轍至任。九月，提升為起居郎，十一月再升為中書舍人，以後又歷任戶部侍郎、翰林學士、吏部尚書、御史中丞、尚書右丞、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等職。整個元祐時期蘇轍身居要位，又曾出使契丹，在內政外交等方面充分顯示了他的吏事才能和正直不阿的品格。從這個時期他所上的一百五十多篇奏章來看，他不苟附司馬光的盡廢新法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新法採取了慎重態度。文彥博欲使黃河向東回流，他也不顧情面，極陳弊害，表示反對。他還提出了綏靖邊陲、賑濟災民、免除積欠、裁減浮費等積極可行的改革意見。故南宋章謙盛讚蘇轍

為“元祐名臣，行事在國史，聲名在天下，人其誰不知之”（《蘇文定公謚議》）。

元祐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九月，高太后去世，哲宗親政，起用新黨，蘇轍受到了排擠。在紹聖元年（公元1094年）一年之中連遭三次貶謫，先是出知汝州（今河南臨汝），再移知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，復降為朝議大夫分司南京（今河南商邱），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居住。紹聖四年又被遠謫為化州（今廣東化縣）別駕，雷州（今廣東海康）安置。元符元年（公元1098年）被移居循州（今廣東龍川）。元符三年正月，哲宗崩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他被量移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、岳州（今湖南岳陽），最後他寓居許昌潁水之濱，杜門謝客，過了整整十二年的孤獨的隱居生活。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十月三日病逝，享年七十四歲。後追復為端明殿學士，謚“文定”。

誠如《蘇文定公謚議》所說：“轍之平生梗概與蘇軾略同，而宦達過之。”蘇轍的性格較蘇軾沉靜，不像蘇軾那樣外露，行事也較穩健，所以終其一生職位比蘇軾高，而磨難比蘇軾少，應驗了蘇洵在《名二子說》中的預言：“是轍者，善處乎禍福之間也”。

蘇轍一生著述甚富。詩文集有《樂城集》五十卷、《樂城後集》二十四卷、《樂城三集》十卷、《樂城應詔集》十二卷，“為轍所手定，與東坡諸集出自他人裒輯者不同。”

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通行本有四部叢刊本，以及四部備要本（未收《樂城應詔集》）。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樂城集》點校本，較為詳備。此外蘇轍尚有學術專著《詩集傳》二十卷、《春秋集解》十二卷、《古史》六十卷、《龍川略志》十卷、《龍川別志》八卷、《老子解》二卷等。

蘇轍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。他的散文創作的理論突出地表現為“為文養氣說”。這一觀點比起前人來有所創新和發展。孟子說：“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）意思是說，只有主觀上不斷加強道德修養，才能培養出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。後來曹丕在《典論·論文》中提出“文以氣為主”，把孟子的知言養氣說發展為“文氣”。曹丕所說的“氣”，是指作家的氣質和個性，由此而形成獨特的為文風格，各有所長，難可兼擅。但他過分強調了作家的材性、氣質的先天性，“不可力強而致”，“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”，這就忽視了作家的社會實踐和藝術修養對於“氣”的形成的重大作用，顯然有所偏頗。蘇轍在《上樞密韓太尉書》中說：“以為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”，就是說作家養足了氣，可以由氣而形成文。因此他又指出：“氣充乎其中，而溢乎其貌，動乎其言，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”至於如何養氣呢？他既肯定了內心修養的作用，認為孟子善養浩然之氣，所以“文章寬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間，稱其氣之大小”。與此同時，他更重視客觀閱歷的實踐意義，認為百氏之書不足以激發志氣，應以司馬遷為榜樣“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趙間豪俊交遊”，纔能養足浩然之氣，寫出“頗有奇氣”的好文章。此外，他在《墨竹賦》中，具體闡述了熟悉描寫對象對於創作的重要意義。蘇轍的這些見解，對豐富古代文藝創作理論作出了貢獻。

關於蘇轍散文的風格，蘇軾說，子由之文“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嘆之聲，而其秀傑之氣，終不可沒。”（《答張文潛書》）蘇轍自己則說：“子瞻之文奇，余文但穩耳。”（《樂城遺言》）“汪洋澹泊”，以及與“奇”相對而言的“穩”，

構成了蘇轍散文的基本特色。

蘇轍的論說文，議論不像蘇洵那樣卓厲風發，咄咄逼人，而是紆徐平和，不作劍拔弩張之勢。如他的《君術策》、《臣事策》、《民政策》等政論，都論述當代朝政要事，指陳利弊得失，而在作法上，“其正意不肯一言道破，紆徐百折而後出之。”（《古文辭類纂》）以期收穫令讀者心悅誠服的效果。他的不少史論，是翻前人案的，寫來也心平氣和，不擺出與人爭辯的架勢。如《唐太宗》，主旨是批評唐太宗的“未聞大道”，缺乏遠謀。但欲抑先揚，先是極力稱頌唐太宗“自西漢以來，一人而已”，“自三代以下，未見其比也。”然後不慌不忙地引入正題，列舉大量史實，反覆比襯，充分論證，最後水到渠成，得出了“太宗惟不知道，雖天下既安且治，而幾至於絕滅”的結論，令人信服。蘇轍的論說文雖不似其父的精深老辣，使氣駢詞，但持論平妥穩當，說理嚴密透徹，時有不凡識見和較強的現實針對性，獨特的風格宛然可見。

宋人在唐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“記”這類文體的社會內容，和思想情感的容量，敘事記物的同時，輔之以議論感慨，使一些記文，寓意遙深，異彩斐然。蘇轍的記，數量雖不多，却頗能體現宋人“記”體文章融敘事、寫景、議論、抒情於一爐的特色，與蘇軾的記文各擅其美，體現了蘇轍散文的最高成就。如《東軒記》，僅於開篇概括地記敘了東軒的營建與有關的情形，緊接着由此生發出大段的議論，形象地繪寫了歷經坎坷的人生感慨和厭倦官場的情懷。《武昌九曲亭記》則用記遊的方式寫來，將寫景、寫人、抒情巧妙地融為一體，以簡練的筆墨畫出了武昌山水景物的清靜幽美，把蘇軾陶醉於山水之間的形象與情懷刻畫得瀟灑絕俗。

通篇貫串着“天下之樂無窮，而以適意為悅”，“孰知得失之所在”的超然豁達的思致，與《東軒記》作法不同，本篇無集中的議論，僅在篇末點出，用意曲折可玩。《黃州快哉亭記》，更被清代儲欣譽為“汪洋若千頃波”，“次公（蘇轍）集中第一乘文字”。作者擒住題目中“快哉”兩字生發，一篇之中“快”字七出，極寫其觀賞形勝與覽古之快，抒發了不以個人得失為懷的思想感情，道出了一條人生哲理：心中坦然，無往而不快。文中描寫景物生動逼真，寓情於景；議論則痛快淋漓，兼帶抒情。排比對偶句的穿梭運用，音節和諧鏗鏘，辭彩絢爛華美，在紆徐條暢之中又給人以雄放雅致的感覺。凡此均體現了宋代散文作家的創造精神。

蘇轍的書啟文章，也不乏出色之作。其特點是善於根據不同的對象，從揣摩對方的心理着筆，披陳自己的衷曲以取得對方的理解，達到寫信的目的。如《為兄軾下獄上書》，情辭懇切悲惻，措詞極為巧妙，委婉而又明確地抒寫了手足的相知和情誼，指出了有司將蘇軾下獄是算老賬，罰不當罪。因為這封信是寫給皇帝看的，必須避免觸犯皇帝的尊嚴，因此全文處處設防，用筆十分謹慎，既毫不含糊地申明理由，提出請求，又處處合乎身份，寫作技巧可謂高明。《上樞密韓太尉書》、《上昭文富丞相書》、《上劉長安書》，雖然都是干謁求仕信札，而立意行文，一如精構之章，超然逸出干謁的狹隘目的。與韓琦，款款而談為文養氣；與富弼，侃侃而議為相之道；與劉敞，則以折節下士為論題。或取譬設喻，或引用故實，語意酣暢，寓剛勁於委婉，無一句卑辭諛語，却處處可見傲岸磊落之氣。蘇轍給韓琦信中，稱羨司馬遷“其文疏蕩，頗有奇氣”，後人也常以此八字來稱許蘇轍在這書啟文辭中顯現出的見識和文才，洵非虛譽。此外，蘇轍